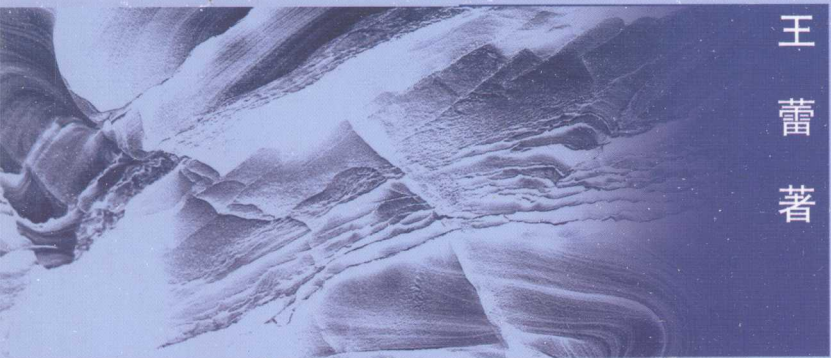


佛克马研究

FOKEMA YANJIU

王蕾 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

014036857

10-03
79

佛克马研究

FOKEMA YANJIU

王蕾 著



10-03
7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克马研究 / 王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61 - 2364 - 5

I. ①佛… II. ①王… III. ①佛克马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 63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12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4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差异的合法性与卓越的跨文明学术对话

——为王蕾《佛克马研究》序

2007年4月，我以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名义，代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邀请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Douwe Wessel Fokkema）作为引进的外籍专家，来四川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其间他为各级各类学生举办了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两大板块的讲学，并与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博士生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佛克马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国际文学史、互文问题、接受美学、文学及文化成规等方面的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因区分了实证性研究和文本阐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他突破欧洲与北美文化中心主义及文学理论的樊篱，正视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化成规的差异导致的文化立场倾斜与文学研究方法的缺失。同样近年来，我以中国学者的立场从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①从学理上讲，比较文学变异学即是从跨越异质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正视东西方尤其是中外文化文学的差异，同时以文学性、审美价值为基点，对中国文学、文论与文化经典的美学阐释与实证、跨文化流传的考证及变异研究，以及中国独特的文论话语范式与西方文论范畴的对话与辨异，探究隐藏于其后的普世性规

^① 曹顺庆、李卫涛：《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律，应对差异与变异带来的理论缺乏及方法论挑战。

王蕾是一名我颇为赏识的学生，她以其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扎实的文学理论根基，在佛克马访问川大期间，全程担任翻译及教学助理工作。出色的翻译及学术工作，赢得了佛克马与蚁布思夫妇的肯定与认同。借此她取得了关于佛克马文学研究的所有资料，这些第一手材料是可信而绝少毗误的。（其中，佛克马将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研究》一经出版，就寄给了她。而几天后，这位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重要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理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作为四川大学一名中国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蕾在四川大学所建立的比较文学国际交流平台上，依靠自己良好的素养，直接与国际知名的理论家对话，阅读他们的原作，即时与他们沟通学术研究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这是我在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强调的，王蕾完满达成了我对学生的预期。

王蕾是一个优秀的青年学者，她的博士论文是她扎实学术研究工作的结晶。如今王蕾的这部博士论文经他修改与补充后，将要面向中国的读者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并欣然答应为其作序。这部著作中，以其清晰的理论梳理与辨析，使我们明了佛克马的文学研究体系及其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突显中国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佛克马以其多语运用，欧洲学者的学术背景，又以影响当代文学研究的种种理论与方法，包括波普尔的“证伪、证实”科学哲学判断方法，接受美学对当代文学研究视阈的拓展和方法的补充。他以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突显中国文化及文学在世界比较文学体系中的存在意义和跨跃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对差异的关注，在佛克马的研究中，跨文明的视野成为学术的焦点，差异的存在也获得了合法性。解决了无论欧洲，还是北美的话语范式，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缺乏解释效力的问题。

佛克马的学术研究涉及文学理论的各个流派及思潮的辨析，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科学哲学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比较文学旷日持久的辩论，以及其研究的现实困境，可以说，研究佛克马实际上就等同于梳理整个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文学研究方法与立场问题。佛克马是一个比较文学学者，但首先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以审美成规、符码等文学研究单位的界定，辨析当代跨跃异质文明的文学交际语

境中，文学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同时又以科学的方法为基础，辨析了各种理论思潮的源起、影响以及缺憾，对文学理论工具如跨文化互文性、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文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术语使用的有效域做了界定。然而在跨文明的语境中，要选择梳理佛克马学术研究的立场，清晰辨析界定佛克马理论著作中的种种术语，因为涉及哲学与文学话语，所以更要应对翻译工作中所遇到的巨大挑战。王蕾的工作无疑是艰巨而卓有成效的。

佛克马是一位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有着重大贡献的国际学者与友人，同时未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的理论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仍将有所启示。而这其间，多有王蕾的一份努力与贡献，这是一个优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与国际学界学习与沟通的努力，同时为寻找中国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话语范式的勇敢尝试奠定坚实的基础。

曹顺庆

序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厚重的书稿是一位中国的中青年学者根据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改写的专著，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是蜚声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学术大师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1931—2011）。据我所知，这是整个国际学术界第一部以佛克马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而且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一直与研究对象保持接触，因而在一些史实方面自然是可靠和可信的。我认为，它的出版将起到佛克马研究的奠基性作用。由于我曾经在佛克马的指导下在他生前工作过的乌德勒支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同时也由于我担任了本书作者的博士论文评阅人，后来又约请她将博士论文的精华部分改写成一篇长篇论文发表在我主编的《文学理论前沿》第七辑上，因此可以说，我至少仔细读了三遍这部书稿。当作者在完成本书即将送交出版之际，希望我能为之作一短序，我想，无论从何种角度着想，我都无法推脱。

也许广大读者会问，对一位主要活跃在西方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的欧洲学者的全面研究为什么会由一位中国学者来完成？这一方面说明西方学界对佛克马的世界性影响并未有足够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学界确实有人故意忽视佛克马的学术成就。这种文人相轻的情况不仅在中国不乏其例，在国际学界也大有人在。好在佛克马生前热爱中国文化和文学，并热情地给予改革开放后再度复兴的中国比较文学事业以极大的支持。因此他在中国学界有着广泛的人缘和影响，甚至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超过了在欧美国家，尤其是在北美。因此这部专著的出版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了。

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佛克马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不少人都知道，他是荷兰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汉学家。他生于1931年，早年毕业于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获

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在荷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任二等秘书、文化参赞等职。任职期满后长期积极投身于比较文学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先后担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文学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并曾出任过该系系主任兼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1996年退休后任乌德勒支大学荣休教授。佛克马很早就参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领导工作，曾长期担任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等职。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国际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佛克马学识渊博，几乎可以用欧洲所有主要的语言阅读，并用英、法、德文和荷兰文写作。他也通晓中文和俄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尤有研究。

我和佛克马相识纯属偶然，但正是这一偶然的机遇却改变了我后来的学术生涯。那是1985年10月的一天。刚步入而立之年的我出席了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研讨会。那次会议上真可谓群星璀璨，大家如云：国外学者中除了刚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的佛克马外，还有后来成为我学术研究的精神导师的詹姆逊等一大批欧美学者；国内学者中则包括我后来的博士生导师杨周翰和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就在那次会议上，担任大会秘书长的乐黛云教授引荐我认识了佛克马，并叮嘱我把用中文发言的学者的主要观点翻译给他。从那次会后，我便和佛克马建立了学术交流联系，他得知我在南京的一所大学教授公共英语，便鼓励我继续深造，在国内外著名高校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我们临分别时，他甚至更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为我写推荐信。但我后来出于各方面的考虑，还是放弃了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转而报考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佛克马的老朋友杨周翰教授。

1987年7月，当我们在西安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再度见面时，佛克马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叫出我的名字。我们在互致问候后，他亲切地对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佛克马教授了，就叫我“杜威”吧。当他听说我已经师从杨周翰攻读博士学位时十分高兴，殷切地鼓励我努力学习，为中国的比较文学走向世界作出贡献。他还关切地问道，“你完成博士学业后打算怎么办？”我想了想漫不经心地问道，“当然希望到欧美去深造了，但不知能否如愿以偿？”他随即希望我完成博士论文后立即告诉他，他帮我到欧洲从事

博士后研究。1990年，在身为皇家科学院院士的佛克马和他在乌德勒支大学的同事伯顿斯的大力推荐下，我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荷兰皇家科学院的博士后基金，前往佛克马任教的乌德勒支大学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合作导师就是为我争取到这笔研究基金的佛克马教授。可以说，正是在欧洲度过的那一年里，我收获颇丰，不仅掌握了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的技能，而且还遍访了欧洲名校，在那里作了十多次演讲。此外，我对佛克马的学术思想和为人也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对佛克马的学术理论贡献作了如下概括：（1）作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加以改造并引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他对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兴趣东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他对文学经典建构及重构的讨论，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为中国文学的进入全球视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他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使得一部世界比较文学史中有了关于中国及其他东方文学的描述。所有上述三点都与中国有关，这正是他毕生感到自豪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的视野明显高于他的不少欧美同行的地方。当然，晚年的佛克马对自己在学界的“被边缘化”感到十分不满，积极地参加了我主办的有关全球化和文化研究方面的研讨会，并发表了一系列著述，他甚至试图从文学经验研究的角度对风靡英语学界的文化研究进行反拨，并提出了“文化学”（cultural science）的概念，可惜由于他早逝而未能在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建树。由于我和佛克马的特殊关系，我们在一起几乎无话不谈，而这一点也许本文作者并不知道。

纵观佛克马一生的著述，我们不禁惊异地发现，他最早的著作《中国文学与苏联影响（1956—1960）》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在一个广阔的比较文学语境下探讨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想。经过四十多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这部专著已被公认为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而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则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探讨了乌托邦的历史遗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乌托邦因素的力著，该书从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考察了乌托邦小说在中国和西方各自所具有的独特性。从而解构了国际学界在乌托邦研究方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我认为，把中国文学放在一个广

阔的跨文化和跨学科视野下来考察，应该是佛克马的主要建树之一。而他的另两方面建树则分别体现在后现代主义研究和世界文学与经典的重构上。这一点本书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和分析。我这里想再强调：佛克马虽已离开我们，但我们对他的意义和未来的影响远没有充分的认识，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就拿他在下面两个公认的国际学术前沿理论话题方面的建树为例吧。

众所周知，全球化和世界文学这两个前沿理论课题吸引了众多有着理论敏感性的人文学者，佛克马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于世界文学问题，他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有所涉及。在1998年8月18—20日于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佛克马应我邀请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在对全球化的一片批判和欢呼声融为一体的氛围中，他的态度尤为冷静，他更为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他在详细阐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含义和在不同语境下的表现时指出，“在一个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日益同一化所产生的后果威胁的世界上，为多元文化主义辩护可得到广泛的响应”，他认为，“强调差异倒是有必要的”。他在会上发出的一个不同声音是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他在回顾了历史上的世界主义之不同内涵之后指出：“应当对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概念加以界定，它应当拥有全人类都生来具有的学习能力的基础。这种新世界主义也许将受制于一系列有限的与全球责任相关并尊重差异的成规。既然政治家的动机一般说来是被他们所代表的族群或民族的有限的自我利益而激发起来的，那么设计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的创意就首先应当出于对政治圈子以外的人们的考虑，也即应考虑所谓的知识分子”。

就这种新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内涵，他进一步指出，“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的概念。”毫无疑问，此时的佛克马已经不仅超越了过去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局限，甚至在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他凭借自己丰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回顾道，“在中国传统中，历史的层面主导了地理上的分布。整个世界基本上都是根据一种文化模式得到解释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野蛮人中的话，儒

家人性的原则也会适用。中国思想的普遍主义特征直到本世纪才受到若在欧洲便以文化相对主义之名义发展的那些观念的挑战。佛教禅宗这另一个伟大的传统也像儒家学说一样具有普遍主义特征。”应该承认，在西方主流学界，能有如此开放的胸襟和宽阔的视野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现在，在国际学界，世界主义再度兴起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但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英语世界所出版的关于世界主义的重要著述中竟然没有一人引证佛克马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论文，在讨论世界文学这个话题时，也鲜有学者提及他的贡献。

实际上，在国际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中，这位来自小民族荷兰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汉学家尤其注重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普世价值，他在阐释世界文学的二重性时同时强调了其普世性和相对性：没有前者的话，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学都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文学，而没有后者的话，世界文学就将更带有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成为西方文学的有限扩大版。

我们都知道，除了佛克马以外，不少欧美的汉学家也感觉到这种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对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的不利因素，甚至一些长期从事西方文学和理论研究的主流学者也开始重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了。例如，我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勒就在清华大学公开演讲中声称，“假如我年轻20岁的话，一定要从学习中国的语言开始”，因为对他来说，通过翻译了解中国文学是不可能掌握其真谛的。稍微年轻的一位朋友、至今仍持有印度护照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则干脆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从2002年起就旁听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课程，并且尽可能地参加各类汉语考试。而佛克马却得天独厚，年轻时就掌握了汉语，因此他认为，在一部有着更多读者的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化地位这一事实，显然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对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地位的描述是失之偏颇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如同一个幽灵，始终萦绕着西方文学史家们的记忆，甚至在描述世界文学时他们也不愿放弃这一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因此，对于佛克马等有着开阔的世界主义胸襟和比较意识的西方有识之士来说，采取一种二元论的分类法倒是颇为适当的。

最令我感动的是，就在佛克马处于弥留之际时，还不忘把他的近著寄给我，在他离世两周后，我收到了他临终前寄给我的新著《完美的世界：中西乌托邦小说》（*Perfect Worlds: Utopian Fic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2011），我匆匆翻阅了这本厚重的专著，顿时感觉耳目一新。正如张隆溪所言，该书“信息量很大，理论成熟，且文字优美，它将对任何对思想史、比较文学和东西方跨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具有感染力。”我认为这是比较准确到位的评价。但我在此还要补充一点，在这本书中，佛克马在提供给我们一幅进入“乌托邦”的理想世界的“路线图”的同时，还提出了为什么会出现乌托邦小说的四点假想。第一，危机时候的乌托邦小说，也即“作家们在危机的时刻，也即当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应对时代的需要时，便诉诸于发明并勾画一个更好的社会，或者在他们看来是更好的社会。”第二，乌托邦概念的世俗化，也即“我们将看到在那些将自己从启示宗教中解放出来的作家中，有着乌托邦叙述的冲动。”第三，反面乌托邦与乌托邦的对立，也即“我们越是接近政治结构化和工程实践的尝试，包括乌托邦原则的实现，我们就将在试图暴露良好愿望导致的不良结果的反面乌托邦作品的增多中看到更大的机会。”第四，文化差异与中欧乌托邦思想的逆向发展，也即“中国和欧洲的乌托邦小说所经历的是相反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于佛克马来说，从乌托邦小说的视角切入，进行这种跨文化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当然难度也是很大的。我认为，本书如能就这部专著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讨论将更有价值和意义。

当然，作为一位青年学者的学术专著，其中的缺陷和不完善之处是在所难免的，我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本书后完全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在此仅以这一短序再次表达我对已故的佛克马教授的怀念之情，同时也寄予我对后学的希望和鼓励。

王 宁

2012年5月20日于北京

目 录

引言 佛克马文学理论的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与目标	(1)
一、佛克马文学理论的研究价值	(2)
二、研究对象界定及研究现状	(18)
三、基本内容与创新目标	(35)
第一章 文学语言研究：重写与跨文化互文性	(38)
第一节 互文性、跨文化互文性与重写	(38)
一、互文性及跨文化互文性	(39)
二、重写的界定	(43)
三、互文性、重写与主体性	(46)
第二节 重写与审美体验	(50)
一、审美研究的衰落与复兴	(50)
二、佛克马对审美的定义	(54)
三、重写的审美体验	(59)
第三节 重写与跨文化互文性的实证性研究	(61)
一、东西传统中的诸种重写	(61)
二、跨文化互文性	(66)
三、重写的动机和方式	(69)
第二章 文学接受研究：历时与共时的传播	(76)
第一节 现代西方文学接受研究	(77)
一、接受美学的缘起	(77)
二、德国接受美学的主要贡献	(82)
三、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	(86)
第二节 文学接受的历时研究	(89)
一、文学作品观念的演变	(90)

二、审美规范的变化与文学接受	(92)
三、接受史研究实证举隅	(98)
第三节 跨文化文学接受	(102)
一、文学成规与文学接受	(103)
二、文学接受与文化身份认同	(107)
三、文学接受与经典的形成	(111)
第三章 文学史观	(116)
第一节 文学史的性质	(116)
一、阻碍文学史研究的几种观点	(117)
二、文学史的性质	(121)
第二节 文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24)
一、文学史编撰的前提:文学符码	(125)
二、文学史与实证研究	(129)
三、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与历史解释	(131)
四、文学系统变化的动因	(133)
第三节 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社会话语与符码	(135)
一、象征主义	(135)
二、表现主义	(138)
三、现代主义	(140)
四、后现代主义	(144)
第四章 比较文学观	(151)
第一节 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	(151)
一、文化相对主义的起源	(152)
二、文化相对主义与比较文学及文化关系	(154)
三、文化相对主义的相对性	(162)
四、文化相对主义引发的讨论	(166)
第二节 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	(169)
一、比较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70)
二、实证主义影响研究反思	(174)
三、跨文化平行研究反思	(177)
四、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范式	(181)

第三节 新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	(183)
一、西方世界主义思想的源流	(183)
二、全球化时代和多元文化主义	(185)
三、文学审美阅读与新世界主义的建构	(188)
四、世界文学的反思	(190)
结语 佛克马文学理论的意义及局限	(193)
附录一 佛克马教育、工作及学术活动年表	(200)
早期个人资料	(200)
教育经历	(200)
工作经历	(200)
学术荣誉	(201)
编辑委员会成员	(202)
系列丛书	(202)
期刊	(202)
其他专业职务	(202)
附录二 佛克马主要专著及参编著作表	(204)
专著及合著	(204)
编著及期刊的专刊	(205)
附录三 佛克马发表于学术期刊或其他论著的文章 (至 2008 年)	(207)
参考文献	(221)
英文部分	(221)
中文部分	(227)
中文期刊文章	(231)
后记	(232)

引言

佛克马文学理论的研究价值、 研究现状与目标

在 21 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在回顾“批评的世纪”——20 世纪时，我们发现 20 世纪的文学批评活跃强劲、多姿多色、全面深刻，不但堪与文学创作平分秋色，甚至于使文学创作相形见绌。首先，从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符号学以至于后结构主义，从精神分析批评到文学社会学和接受美学，从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内部研究到现象学批评、阐释学……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层出不穷，各领风骚，其新颖性和深刻性远远超过了此前的 19 世纪。其次，20 世纪文学批评的特点还表现在批评家们和研究人员强烈的总结意识。无数的批评论著和相关文章都力图从共时和历时研究两个方面建立一种完整的体系、学说和方法论，或者对某一领域进行系统的总结。对“文学性”的不懈探讨、对模仿说的反思、对风格和意象的研究，无不是这方面的成果。另外，不容忽视的是 20 世纪的批评论著知识含量的渊博性。学者们相继运用各种人文科学，苦心孤诣地建立一门文学科学。^①然而，在我们说 20 世纪是批评的世纪时，也意味着 20 世纪也是一个我们对以往的文学批评进行批评总结的世纪。此外，20 世纪文学批评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就是逐渐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开始关注东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

与 20 世纪文学理论兴衰相伴的是 20 世纪文学批评大师和文学理论大师的层出不穷，雅克布森、罗兰·巴特、巴赫金、热奈特等，指不胜

^①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7—8 页。

屈。他们或开创新的研究范式，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但都自成一格。而在20世纪后半叶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杜威·佛克马（Douwe Wessel Fokkema）在努力建立一门文学科学、对以往的文学理论进行反思和批评以及国际文学界研究兴趣的东移这几方面无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大师的行列中，佛克马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尽管也涉及文化研究，但综观其文化思想，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文化研究思想是以文学研究为出发点，并且以文学研究为旨归的，这使其理论研究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一、佛克马文学理论的研究价值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但是这门学科在诞生不久即因为来自圈外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而被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定义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①而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基亚则一再宣称：“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②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更为精确地说明：“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韦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③这样比较文学的研究就轻易地把东方文学排除在外，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圈子里寻找文学之间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学派的崛起，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被大大地拓宽了，雷马克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④但是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还是在西方文化圈内的。美国比较文学的权威学者韦斯坦因就曾明确表示：“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做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5页。

② 基亚：《比较文学》，见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6—77页。

③ 卡雷：《〈比较文学〉初版序言》，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3页。

④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组编《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